

# 秘魯動亂之源：「光明之路」

劉天均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 一、前言

近日來，全球媒體曾多次報導南美秘魯所發生的霍亂病情。根據聯合國衛生組織的預測，如不能及時予以有效的撲滅，拉丁美洲將面臨一次「霍亂風暴」，約六百萬人受其侵害，其中四萬餘人會因此死亡。目前已知千餘生命為其所奪，另十數萬人口已遭其侵襲，而且已自秘魯蔓延至厄瓜多爾、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智利和巴西等國，很可能演變成本世紀拉美地區最大的人類悲劇。<sup>①</sup>

然而除了上述之霍亂病毒以外，秘魯近十年來還遭受著一項社會病毒的侵害，而這項社會病毒乃是本文所稱的「光明之路」——「秘魯共產黨——光明之路」(Partido Comunista Peruano—Sendero Luminoso/PCP—SL)。此一共黨組織是由一位任教於秘國聖克里斯托巴大學的哲學教授古茲曼博士(Dr. Abimael Guzman Reynoso)，<sup>②</sup>根據秘魯共黨鼻祖馬里亞蒂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所揭櫫之「革命理論」，<sup>③</sup>以及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等而組成之極左共黨游擊隊。因其特別崇拜毛思想中所強調之農民革命與「以鄉村包圍城市」之叛亂策略，故又被稱之為「毛派」。<sup>④</sup>

毛派共黨「光明之路」是一個由秘魯印第安人所組成的暴力恐怖組織，自一九八〇年四月對秘魯大選進行武裝破壞，開始所謂「革命鬥爭」迄今，已進入第十一個年頭。據秘國政府所公布的資料顯示：十年來，直接及間接與「光明之路」暴行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 20, 1991, p. 3; Apr. 27-28, 1991, p. 2.

註② 古茲曼自領導「光明之路」從事暴力活動後，即以化名「岡薩羅同志」稱之。

註③ 關於馬里亞蒂吉的革命理論與主張，請參 Harry E. Vanden, *National Marxism in Latin America: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s Thought and Politic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86), pp. 79-99.

註④ 關於毛派「光明之路」的組織及其發展過程，參劉天均，「秘魯毛派共黨『光明之路』組織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第二十七卷第二期，民國七十六年十一月，頁八八～九七。

有關之生命和財產的損失爲：死亡人數達二一、〇〇〇人，財產損失達二〇〇億美元。<sup>⑤</sup>在同一期間內，「光明之路」的組織力量已由當初的數十人，發展至目前的五千餘人；其所盤據的「革命基地」也從安第斯山區的一個城市阿亞古喬（Aya-Cucho）向四周城市及鄉鎮擴展，目前已控制著秘國二十三個大行政區中的六個，以及生產古柯鹼的「上瓦列加谷」（Upper Huallaga Valley）等地區，幾達全國四分之一的土地。<sup>⑥</sup>

經過十年暴亂，「光明之路」這個恐怖共黨組織已對秘魯社會及人民造成既深且劇的傷害，可謂罄竹難書。今就其對秘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所造成之負面影響或衝擊，予以分析，以明其爲禍之一斑。

## 二、對政治體系之衝擊

根據「光明之路」所主張之「四階段革命理論」，<sup>⑦</sup>自一九八八年春以降，其革命進程已邁入第四階段——奪取政權。在此一最後階段內，該組織的革命行動綱領乃是：以鄉村包圍城市，並發展城市革命力量，進而毀壞資產階級的統治機器，取得人民主權，建立「新社會主義共和國」。

然吾人若就「光明之路」的具體行動與實際所達成之目標，對其「四階段論」加以檢視之，即可發現其當前行動結果、自我宣傳與計畫目標三者之間，仍存有相當之距離。即該組織的鬥爭形式仍未脫離游擊戰而進入「人民戰」的階段，雖然其盤據的「革命基地」確已大幅擴展，並對沿海城市形成包圍的戰略態勢。

目前雖未完全摧毀資產階級的統治機器，但已在其控制區建立起或明或暗的「新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或社區組織，如「人民委員會」（Comité Popular）之類的經社一體組合。<sup>⑧</sup>並在該游擊組織經常出沒或斷續監控的地區，如胡寧（Junin）

註⑤ *FBI*-LAT-91-005, Jan. 8, 1991, p. 28.

註⑥ 秘魯將全國劃分爲二十三個大行政區和一個憲法省（直轄省），再分之爲一四八個省，其下共轄一、六六二個自治區；關於「光明之路」當前所控制的地區，請參 *Richard Saar,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90*, pp. 136~139.

註⑦ 關於「四階段革命論」之階段劃分：（一）準備階段（一九六四~八〇），其階段目標以組訓爲主；（二）武裝鬥爭（一九八〇~），革命綱領以攻擊資本主義及其代理人爲行動目標；（三）暴力普及（即擴大叛亂，自一九八五年迄今），將武裝鬥爭的形式自游擊戰法轉變爲「人民戰爭」，並擴大革命基地和解放區，對各地方政府及中央機構形成包圍態勢。因其時間劃分與目標設定並非截然明確，故僅註其起始年代。至於「四階段論」之內容，請參 *Richard Saar,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82*, pp. 122-123;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Andes*, Oct. 8, 1983, p. 2.

註⑧ *FBI*-LAT-91-006, Jan. 9, 1991, p. 37.

行政區內的數個行省中，驅離或阻却由政府所遣派之官吏，從而造成地方政府虛設與吏治之中斷。<sup>⑨</sup>

除了對地方政府機構進行威脅或恐怖攻擊外，對各個黨派（包括左派政黨在內）的政治活動分子或參與地方公職的候選人，也不放過。如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的地方選舉中，「光明之路」為破壞此一選舉而發動一次大規模代號為「紅色十月」的恐怖攻擊，全國共有四百餘人因此而死於非命，另有二六三名候選人因遭恐嚇而退出選局。<sup>⑩</sup>甚至連「左派聯盟」和秘共（親蘇之正統共黨）地方黨部的書記也頻遭該游擊組織的毒手。所以，僅在一九八九年一年之內，秘魯全國便有一、六〇〇餘人死於暴亂。雖然此次選舉終能如期完成，但在某些為「光明之路」所控制的地區，或因投票率太低而流產，或開出高額的廢票率（阿亞古喬的廢票率高達六六%），致全國之有效投票率尚不及總投票額的七〇%。<sup>⑪</sup>

一九九〇年既是秘國的大選年，又是「光明之路」武裝暴動的十周年，所以該組織原計畫在是年四月的總統與國會議員選舉時，再次製造一個恐怖高潮，以展現其革命實力。於是，一則鼓動全國運輸業者在選舉期間罷駛，另則威脅選民不得投票，否則，將遭嚴厲之報復。<sup>⑫</sup>然在四月八日投票前後，各地投開票所及選務單位曾遭到各種恐怖性攻擊，但並未因此而受嚴重的影響，全國的投票率仍達七二·九八%，不過所開出之廢票（包括空白票）仍然為數可觀。

根據秘國的研究專家所指，「光明之路」之所以未能在其革命十周年的關鍵時刻，按照原計畫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恐怖風暴，以事紀念，係因內部在鬥爭路線上發生分裂。即在檢討其十年鬥爭經驗時，少數幹部對古茲曼的暴力路線提出質疑，認為恐怖行為所產生的效果對實現長程革命目標，無甚助益，從而暫時放緩其針對大選的攻擊活動。<sup>⑬</sup>然據其他專家指出，「光明之路」的內部分裂固是事實，但不會因此改變其暴力本質與武鬥路線，惟將乘機調整其鬥爭策略而已。

依據一九九〇年所調整之鬥爭策略，「光明之路」現正在各大都市中發動「勞工階級自覺運動」（Movimiento Obrero y Trabajadora Clascista—MOTC），藉以提高都市勞工的階級意識，使其與資產階級及該階級的代言人——「美革聯」（A PRA）、「民主同盟」（Fredemo）和「左聯」（IU）等黨派劃清界限，並與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光明之路」結為同盟，以擴大其在都市中的群眾基礎及草根性。然此一鬥爭策略的轉變，亦與其進入所謂「革命第四階段」之戰略部署，息息相

註⑨ 胡寧區的八個行省中的一〇七個市鎮，因屢遭「光明之路」的恐怖襲擊與威嚇而無行政首長，或在公務員出缺後，無人甘冒生命危險而前往任職。請參見 Comercio, Dec. 21, 1990, p. B-23.

註⑩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Nov. 16, 1989, p. 1;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 1990, p. 138.

註⑪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Nov. 23, 1989, p. 1.

註⑫ Geoffrey Biddulph, "Maoist Rebels Wage Campaign of Terror Against Peru Polls", The Daily Telegraph, Mar. 29, 1990.

註⑬ Vidal Silva, "Internal Split Slows Shining Path Guerrilla," The Daily Telegraph, May 23, 1990.

關。<sup>⑭</sup>

綜觀秘國一九八九及一九九〇年兩次選舉結果，以及對選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加以分析，則可發現「光明之路」的歷次恐怖暴行雖未嚴重破壞秘魯的政治體系及妨礙其正常運作，但彼等在鄉村及城市所喚起之工農階級意識，對主張改善貧困工農生活條件的候選人及日裔籐森的當選，已起了積極的作用，<sup>⑮</sup>甚至對籐森政府的政、經政策與社會法案等，產生主導的功能。

### 三、對秘魯經濟的影響

政治環境的不穩必然會直接間接地影響經濟發展。秘國的政治概況既如前述，其經濟情況的日趨惡化也是世人皆知的事。其一九八九年的通貨膨脹率為二、七七五%，次年的通膨率仍高達二、五〇〇%，其一般經濟情況仍然相當惡化。由於人民之購買力已近枯竭，市場的銷售力在一九九〇年下降七〇%，導致全國七千餘家中小企業相繼倒閉，使失業人口陡增至八十萬，其就業率僅及一九六九年的水平，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則向後倒退了三十年。<sup>⑯</sup>

形成秘國經濟不振的因素固不止一端，除了經濟制度之不健全與政策上的多項失誤、財稅紀律的廢弛，<sup>⑰</sup>以及政府官吏的貪墨腐敗之外，「光明之路」的連年破壞與恐怖活動，也為秘國的經濟惡化，雪上加霜。前曾提及，「光明之路」的十年猖亂，已為國家造成二百億美元的財物損失。

今據秘國媒體在農業方面所作之片斷報導稱：僅胡寧與巴斯柯（Pasco）二地區的數省之農田，因遭「光明之路」的不斷侵襲與恐怖活動而大部休耕或荒廢，致該二地區的農業生產下降九〇%，<sup>⑱</sup>已造成農民無以為生的困境；在政府照顧不及

註⑭ *Resumen Semanal*, Jan. 22~28, 1988, p. 2; *Quehacer*, Lima 53, 1988, p. 17.

註⑮ 在一九九九及九〇年的兩次選舉，所顯示之結果如下：在一九九九年的地方選舉中，無黨籍的獨立候選人貝爾蒙特（Ricardo Belmont）獲得利馬四五%的選票而當選為市長；其餘無黨籍人士在全國各地獲得三〇%的選票；執政的「美革聯」輸得最慘，僅爭得全國一八%的選票；「左聯」獲得二〇%，而「民盟」則得到三七%選票的支持。一九九〇年四月的總統選舉，由新組成的「變革九〇」（Cambio-90）候選人日裔籐森獲得最後的勝利，其所顯示的意義已非公共政策一途所能說明了。

註⑯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Oct. 11, 1990, p. 2.

註⑰ 秘國的地下經濟活動非常猖獗，其比重已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四〇%；在此情形下，其稅收狀況便可想而知了。請參 *Hernando de Soto, The Other Pa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9), p. 12.

註⑱ *El Comercio*, Dec. 27, 1990, p. A-15.

秘魯動亂之源：「光明之路」

的情形下，部份農民已棄家外逃，從而造成都市人口急劇膨脹，失業情況也隨之益形惡化。<sup>19</sup>

另則，「光明之路」爲了增強其對政府的經濟壓力，一面發動其外圍組織在大都市製造社會運動，一面則對城市進行某種程度的經濟封鎖，如禁止鄉村的農礦產品輸往城市或運出國外。如在一九八九年夏季，「光明之路」對政府軍的清剿行動進行報復，乃封鎖胡寧、巴斯柯、華奴考（Huanuco）三個地區的礦產和穀物輸往沿海的都市，此不僅對城市市場造成供需失衡，而且嚴重影響工業生產及原料的出口。如再配合採取斷電或阻礙交通的方式對各大都會區進行騷擾，則秘國在經濟方面所遭受的損害當更加慘重了。<sup>20</sup>

由於「光明之路」係以安第斯山區的印第安人農村爲其革命基地，並以建立農村公社爲其所持的政經理念，其主張與作爲頗似赤柬的波布政權，具有濃厚的狹隘種族意識，故其排他性和排外性很强。因此，凡屬外來的科技人員或從事農牧研究的專家，均被列爲排斥或殺害的對象。例如政府在山區農村所推動的鄉村發展計畫及農業推廣實驗工作，皆被「光明之路」貼上「資本主義文化侵略」的標籤，而脅迫其停止運作或予以破壞。<sup>21</sup>甚至連外國的農技顧問或畜牧研究人員，也淪爲彼等的攻擊目標。例如由美國「開發總署」所派遣之農業專家和法國前往鄉村從事駝馬及駝羊研究之畜牧技術人員，或被驅離，或被殺害。<sup>22</sup>此類非理性之暴行不僅引發國際社會之譴責與公憤，而且更嚴重的阻礙了秘國農村經濟之發展——約七〇%的農村發展計畫已陷於半停頓或終止的狀態。

另一項影響秘國經濟的問題則是「光明之路」與毒（古柯鹼）梟勾結營私。自一九八七年以降，便開始在秘魯東北部的叢林山區與當地的毒品走私集團狼狽爲奸，從事國際「毒品恐怖主義」（Narcoterrorism）活動。近幾年來，更進而在盛產古柯鹼的上瓦列加谷地區，從事毒品走私的保鏢勾當，抽取十分之一的「税金」，約每年從中獲得數億美元的資金及相當數量的軍火供應。<sup>23</sup>此類勾當不僅增強了該暴力組織的物質力量，且使秘國的地下經濟活動益加猖獗，更嚴重地擾亂了秘國的

註<sup>19</sup> *Expreso*, Oct. 1, 1990, p. 1; *FBI/SLAT-91-006*, Jan. 9, 1991, p. 37.

註<sup>20</sup> Sandra Woy-Hazleton and William A. Hazleton, "Sendero Luminoso and the Future of Peruvian Democrac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2, No. 2 (Apr. 1990), p. 28.

註<sup>21</sup> 如在撲諾省所建立之「農村研究所」和在阿亞維里地區所設置之實驗農場，以及在安卡溪所成立之畜牧改良實驗所等，均先後在一九八九年左右被破壞。請參 Richard Saar, *Yearbook 1990*, p. 138.

註<sup>22</sup> Sandra, *Op. cit.*, p. 29.

註<sup>23</sup> 上瓦列加谷地區之居民，約六萬戶從事種植古柯爲生，每年約生產價值三十億美元之古柯鹼，經哥倫比亞之國際販毒組織輸往美國，其中三分之一的所得（約爲十億美元）流回農民的手中，而「光明之路」從中抽取十分之一，作爲保護費。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4-10, 1990, p. 19;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 13, 1990, p. 5.

經社秩序。

然而，「光明之路」與毒梟掛鉤，兩惡相濟，雖可獲得豐厚之物質利益，但亦須為此付出頗高的「政治代價」，因為此一勾結不僅將使其「革命目標」日益模糊，並使其抗爭的面向漸趨「國際化」——引進美國的掃毒力量。<sup>②4</sup>

#### 四、與人權相關之問題

在拉丁美洲各國中，人權問題似乎是一個通象，但秘魯的人權問題較他國更為嚴重，因為該國的民主政治未上軌道、法治不彰、教育程度落後且普及，再加毒梟猖獗與「光明之路」的長年作亂而導致社會動盪與軍事行動，更為這個國家的人權問題蒙上一層陰森恐怖的氣氛。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最近所發布的資料顯示，在「光明之路」的十年暴亂歲月中，秘魯的人權狀況在全球保有最差的紀錄。一九八九年的全國「強迫」(Forced)失蹤的人口在五百人以上，是全世界失蹤人口最多的國家。<sup>②5</sup>尤當該組織與毒梟進行聯合「毒品恐怖主義」活動，而招致政府軍在各地實施所謂「搜索摧毀」之威力掃蕩時，當地的無辜村民便成為毒梟、政府軍、「光明之路」三方恐嚇、勒索、擄掠、私刑和殺害的對象。僅上瓦列加谷一地在一九八九年遭害的農民即多達二五三人，強制失蹤者五十二人。<sup>②6</sup>

秘國政府對「光明之路」既採「剿撫並施」的戰略，故在進行強力軍事打擊之後，便立即派遣保安單位(Sinchis)由情治機構所統屬之武裝警察(維持地方治安，並令其在當地農民中組織「民防自衛隊」(Rondas Campesinas)，在武警的訓練與指導下，以極為簡單的組織與頗為落後的裝備，與「光明之路」的游擊力量相抗衡。此一由人民自動保土衛鄉之構想固然立意極佳，但其所發揮的實際防衛功效則微乎其微，甚至為村民帶來更大的麻煩和更大的不幸。即在倡組之初，農民因懼於「光明之路」的威嚇而表猶豫或加以拒絕，遂被治安單位視之為共黨的外圍分子、同情者、同路人或線民，而有被強制失蹤之慮，使人民經常處於「白色恐怖」的氣氛之下。<sup>②7</sup>如被迫而勉強加入此一自衛組織，則又被「光明之路」目之為「奸

註②4 在與美國協力打擊毒品方面，藤森總統準備接受布希政府的要求，與美建立聯合掃毒武力，但主張美國除向秘國提供三、五〇〇萬美元之軍援外，尚須增加經濟援助。請參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Apr. 4, 1991, p. 5.

註②5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4-10, 1990, p. 3. 惟另據聯合國人權組織稱，一九八九年失蹤人口在四百人以上，且被列為全球連續三年最高失蹤人口之國家，請參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0, 1990, p. 4.

註②6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4-10, 1990, p. 3.

註②7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10, 1990, p. 4.

民」或叛徒，而成爲日後被摧殘及被殺戮的對象。於是，蒼蒼黎民便淪爲政府與「光明之路」間互鬥的祭品。<sup>28</sup>

此外，因反擊「光明之路」而對秘國人權構成嚴重威脅之另一事實，則是由「美革聯」（一九八五～一九九〇年的執政黨）極右分子組成之「羅德雷格突擊隊」（Comando Rodrigo Franco）所進行的「骯髒之戰」。此一「反共組織」正在秘魯各角落裏進行秘密的「廠」、「衛」活動，彼等常以「反赤色恐怖有理」的信念，以及「自由心證」的方式，對可疑的游擊分子或其外圍人士予以逮捕、酷刑、殺害或使之失踪。<sup>29</sup>甚至將外籍記者、國際人權組織及律師等自由人士，選作秘密攻擊的目標。

尤有進者，法治不彰也爲秘國人權狀況增添了許多不良紀錄，即偵檢單位及司法人員在調查或審理所謂「社會暴力案件」時，常有「假案」、「錯案」、「冤案」等傳聞。此不僅影響政府的司法威信與公信力，更嚴重地踐踏了人民之基本權利，因此，新就任的藤森曾直指某些不良的執法人員是秘魯社會的豺狼、惡棍；<sup>30</sup>同時，也間接影響秘國人民對其國家的向心力，因爲在一九八八年秋的一次民意調查中，五二％的受訪者存有去國之心。<sup>31</sup>

## 五、藤森政府的新對策

「光明之路」的十年暴亂，既對秘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權等已造成如上之種種傷害，而今又積極擴大其叛亂基地，發展其組織，<sup>32</sup>調整其鬥爭策略，爲實現未來的「革命目標」——「新社會主義共和國」。凡此種種均足以顯示其叛亂範圍行將擴大，其恐怖活動將會日趨昇高。

註<sup>28</sup> 此類因參與「民防自衛」而遭摧殘的案例不勝枚舉，如一九九〇年四月中旬，在薩提堡（Satipo）省的一個名爲 Naylan 的小村莊，三十七名自衛隊員遭「光明之路」的集體殺害，三十多家農戶被夷爲平地。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6 ~ Nov. 1, 1990, pp. 1 ~ 2.

註<sup>29</sup> 根據一位在奧卡牙古（Aucayacu）鎮的天主神父向媒體透露：自一九九〇年元月至五月，其教區裏便發生過十五件「強制失踪」案件。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4 ~ 10, 1990, p. 3.

註<sup>30</sup> 關於秘魯司法風紀墮落、獄政之敗壞，職司風憲人員對人權之踐踏，以及藤森總統對司法不良之批評，請參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 14 ~ 20, 1990, p. 4.

註<sup>31</sup>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22, 1988, p. 4.

註<sup>32</sup> 在發展其有生力量方面，「光明之路」現正在全國二十多萬失學失業的高中畢業生中遊說，並在百餘所中學裏爭取教師們的同情與支持，助其在青年學生行列中發展組織或動員參軍。請參 *FBIS-LAT-91-006*, Jan. 9, 1991, p. 37; David P. Werlich, "Fujimori and the 'Disaster' in Peru," *Current History*, Feb. 1991, p. 62.

在「光明之路」的十年叛亂過程中，已經歷貝勞德（Fernando Belaúnde Terry）與賈西亞（Alan García Pérez）兩任政府的清剿，迄今未將其弭平，反益見其猖獗。此亦足顯示政府的清剿政策與清剿行動不足以清除亂源，而且同時說明「光明之路」本身具有相當程度之生存能力，並擁有一個供其繼續存活發展的社會空間。質言之，「光明之路」這個反民主、反理性、反現狀的暴力恐怖組織，純粹是秘魯社會矛盾衝突的當然產物；而在秘魯這個畸型社會——貧富極化、城市鄉村極化、教育程度極化、種族語言以及文化（拉丁與印第安）的兩極分化——的夾縫中為「光明之路」提供了一個雖不廣闊但却可以生存發展的空間。<sup>35</sup>

鑒於上述，藤森政府在各黨民代、輿論界及政府智囊團「自由與民主學會」等各方的檢討與獻策下，採取一項綜合政、經、軍各方相互配合的新策略，其具體的剿撫措施大致如下：

- (一) 建立統一之指揮機構：著由內政、國防、情治各單位建立一個職權統一的剿撫指揮部，負責執行剿撫計畫、維護地方治安、保障人民權益，以及監督各戒嚴地區之政令實施情況；<sup>34</sup>
- (二) 設立治安特別法庭：此類法庭係專責審理恐怖事件或人權問題之案件，以加強司法對維護基本人權所當發揮之功能；

<sup>35</sup>

- (三) 加強文宣工作：擴大宣傳「光明之路」的暴力本質、叛亂過程、恐怖紀錄及其對國民生命財產所造成之慘重損失等，以加強人民對「光明之路」的認識，利於清剿政策之實施；另則可以削弱「光明之路」對人民之蠱惑；

- (四) 成立社會安全基金：在進行軍事剿撫時，政府須對因軍事行動所招致之損失，向人民提供相當之財物補償或給與物質協助，故除由政府編列之專案預算外，並建立社會安全基金，以資穩定社會與民心；<sup>36</sup>

- (五) 加強掃毒運動：秘國政府為了履行其國際義務、穩定內部經社秩序，以及斷絕「光明之路」的外援之路，現正加強毒

註<sup>34</sup> 關於秘魯社會在種族、文化、經濟、價值觀及政治符號的認同等方面之極化現象，請參 Cynthia McClintock, "Why Peasants Rebel: The Case of Peru's Sendero Luminoso," *World Politics*, Vol. 37, No. 1 (Oct. 1984), pp. 48-84; Ronald H. Berg, "Sendero Luminoso and the Peasantry of Andahuaylas," *Journal of Inter-American Studies and World Affairs*, Vol. 28, No. 4 (Winter 1986-87), pp. 165-196; Carol Graham, "The APRA Government and the Urban Poor: The PAIT programme in Lima's Pueblos Jóvene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3, No. 1 (Feb. 1991), pp. 91-131.

註<sup>35</sup> *FBI SLAT* 91-006, Jan. 9, 1991, p. 38.

註<sup>36</sup> *FBI SLAT* 90-238, Dec. 11, 1990, p. 39.

註<sup>37</sup> *Latin American Report*, May 2, 1991, pp. 8-9.



品緝私，掃蕩毒梟及輔導種植古柯（Coca）之農民轉作或轉業，<sup>37</sup>以達直接禁絕毒品之生產與間接打擊「光明之路」的雙重目的。

然而從籐森政府所提之新對策視之，在清剿政策與技術兩個層面雖較以往兩屆政府之相關對策為優，但仍未顧及或充分考慮「光明之路」在秘魯這個極化社會中所賴以生存發展的政、經、文、教等生態環境，以及促成各政治團體、利益團體間矛盾衝突的主客因素。換言之，縱使籐森政府已在策略層面加以調整，却未能在基本人權、經濟生活、社會正義、政治民主、整飭吏治等實質問題上予以適切的改革，則上述之各項清剿與安撫措施也未必能產生如期之效果，因為「光明之路」在秘魯社會中的生存空間仍很寬闊。

## 六、結 語

「光明之路」雖然宣稱其革命進程已邁入「第四階段」，並且在基地擴展、組織發展、鬥爭策略與手段等方面已作出相應的配合，然其殘暴本質、排外與排他意識、反民主及反文明之屬性，狹隘的世界觀和盲動傾向，將嚴重阻礙其「革命前程」，故絕難在秘魯社會中獲得大多數之支持。縱令其「革命目標」已在多數印第安農民及貧困基層中爭到認同，亦難恃其恐怖手段，自民選的政府手中奪取政權，<sup>38</sup>更何況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已在世界各地宣告破產呢！

不過，「光明之路」奪取政權的機率雖小，但仍可享有相當寬闊的活動空間，因為秘魯政府不可能在可見的未來將其「極化」的社會導入合理的、常態的現代化社會，並在短期內解決如上之經社實質問題。

民國八十年五月廿八日脫稿

註<sup>37</sup> 秘魯政府在與美國進行聯合掃毒計畫時，除願接受美國所提供之三、五〇〇萬美元之軍援外，尚要求美方對其補助農民進行所謂「種植替代方案」提供經濟支援（約為九、四四〇萬美元）。請參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March 28, 1991, p. 4.

註<sup>38</sup> 古茲曼於一九八二年宣佈其「五點鬥爭計畫」時，曾表示：「光明之路」的長期奮鬥目標是在未來的七十五年之內奪取政權。請參 David Scott Palmer, "Rebellion in Rural Peru: The Oregon and Evolution of Sendero Luminoso,"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8, No. 2 (Jan. 1986), p. 129;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Report* (Andes Group), Oct. 8, 1982, p. 2; *Caretas* (Lima), Sept. 8, 1982, pp. 20-23.